

# “性别”：戏曲文化研究关键词

李祥林

作者赐稿

—

“gender”（性别，社会性别）一词，无疑是当今社会的热门话题。有学者指出，如果说每个时代都有其学术主题的话，我们这个时代的中心课题就是性别研究，它“关系到思想、艺术、诗歌和语言等方面一个新纪元的诞生，那就是，创造一种崭新的诗学”（1）。兴起于现代并以人文关怀为背景的性别理论（gender theory）或性别研究

（gender studies），作为学术研究的新理念和新视角，正越来越为当今时代的哲学、史学、法学、文艺学、社会学、人类学、宗教学、伦理学、心理学、教育学等人文科学不可忽视。从“人学”层面上看，文学艺术表现人性本质，性别理论探讨两性关系，二者有着顺理成章的联系。因此，将性别批评引入本土戏曲研究乃至包括戏曲在内的俗文艺研究，有历史必然性也有现实迫切性。

## （一）

性别问题作为社会存在久已有之，但由于种种原因，长期不曾被在真正学术意义上作为主要对象纳入研究者视野。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女权运动第一个高潮中，英国作家弗吉尼亚·伍尔夫的《一间自己的房子》（《A Room of One's Own》）和法国作家西蒙娜·德·波伏瓦的《第二性》（《Le Deuxieme Sexe》）问世，为清算男权话语文本里的性别歧视和研究女性文学传统提供了条件。尤其是1969年大洋彼岸凯特·米利特博士的著作《性的政治》（《Sexual Politics》），更以前所未有的激进姿态张扬出文学批评的新视角。米利特明确提出“性即政治”（sexual is political）的观点，在其看来，既然“政治”这术语是“指权力结构的关系和安排，其中一部分人受到另一部分人的控制”，那么，借之概括男女两性历史与现状，即旨在揭示“占人口一半的女人被另一半男人控制的事实”

（2）。标志女权主义文论成熟的该书，包括三个部分：性的政治、历史背景和文学的反映。第一部分将文学批评与社会科学理论联系起来，在宗教、神话学、历史学和心理学的基础上探讨两性权利关系的本质；第二部分综论女权主义运动的发展，她把女权运动第一次高潮（1830—1930）称为“性革命的年代”，而把第二次高潮（1930—1960）称为“性的反革命年代”；第三部分则聚焦文学作品，将劳伦斯、热奈特等名作家作为批评对象，为其第一部分所揭示的性政治提供例证。《性的政治》作者认为，较之民族间、阶级间的冲突，两性间的冲突虽不象国族间的杀伐那样硝烟弥漫血肉横飞，但其远更持久，也从未止息，并且与人

类历史相始终。遗憾的是，在久已定型的男性化视域中，当阶级冲突和民族冲突不断被历史强化并愈演愈烈时，普遍存在的性别冲突却普遍被世人忽略。归根结底，性与性别都是关乎人的本质和社会关系的大问题，其理所当然也是人类意识形态斗争的焦点之一，对之我们没有理由视而不见。在历史跨入人文进步的今天，对文学艺术中性别问题的学术清理成为必然，文艺研究再也不能固守成见将性别批评拒诸门外。

“性别理论”从女性主义批评发展而来，成为显学是在 20 世纪 80 年代。根据大洋彼岸学者伊莱恩·肖瓦尔特对女性主义批评演进史的描述，在妇女解放运动之前，关于妇女写作的评论，采用的是“双性同体诗学”（an androgynist poetics）；60 年代末期，由妇女运动发起了对男性文化的女性主义批评和颂扬妇女文化的“女性美学”

（Female Aesthetic）；70 年代中、后期，随着学院派女性主义批评同跨学科的妇女研究结成联盟，有专注于女性作品研究的“妇女批评”（gynocritics）以及影响颇大的后结构主义的女性主义批评出现；80 年代末，则“兴起了对性别差异进行比较研究的性别理论

（gender theory）”。性别理论不仅仅是从妇女出发将研究对象单向度地限定在“妇女”身上，而是将男性也纳入视野中，从男、女两性关系入手，着重探讨这种主要是由社会性而非生物性决定的性别关系。即是说，“性别”不仅仅是“女性本质”的同义词，“在某些方面，‘性别’这个词似乎超越女性政治，允诺着‘一个更为中立和客观’的学术视角，这个视角比集中研究‘妇女’更容易被男人接受”。根据该理论，“如同‘种族’或‘阶级’一样，‘性别’在所有人类经验中是根本抑或是生物的社会变形”，是在天然生物性基础上更从人类的相互关系和社会历史中不断创造和再创造出来的，其跟社会、文化与心理的结构息息相关。因此，从强调影响性别的非生物性因素的重要性和强调性别如同文化一样是人类建构的产物来看，性别理论所提出的实质上是性别的社会文化建构论。琼·W·斯科特在《性别：历史分析的应用范畴》一文中就把性别分析视为历史概念，认为其理论目的有三：一是在关于性别差异的讨论中用社会形成的分析取代生理决定论，二是在具体学科领域中引进对女人和男人的比较研究，三是把性别作为分析范畴而改变学科范例。惟此，性别理论立足现代人文关怀，聚焦“社会性别”（gender，即不仅仅是纯生理性的 sex，由此可见该理论超越生物学层面的社会学取向），着眼于性别差异研究，关注权力话语下的性别压抑问题，努力从性别视角（gender perspective）重新审视人类的语言、文本、思维特点、叙述方式等方面问题，从而发展出一套性别诗学。就其学术批判精神言，它揭露伪装中立或所谓超性别的文本和话语中潜隐的性别因素，反对抹平性别差异的所谓平等，在“强调所有写作，不只是妇女写作，都带有性别”的同时，对男性中心社会既定话语系统中“占主导地位的成份”

尤加质疑。(3) 这种学术取向和批判精神, 决定了文学和戏剧研究对性别理论的汲取借鉴, 有助于我们重新解读历史和深入认识现实。

性别问题在人类学领域受重视较早。以 1861 年瑞士人类学家巴霍芬的专著《母权论》问世为标志, 接踵而来的有《原始人与性的研究》(恩斯特·克劳利)、《母亲: 情操和制度的起源研究》(布里福特)、《两性社会学》(马林诺夫斯基)、《性别与气质》(马格丽特·米德) 等力作, 为学界熟悉。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 人类学家普遍接受了性别是由文化建构成的观点, 在这方面, 直接关涉 “gender” 的重要著作有卡罗·麦克科马克和马丽灵·斯特拉杉著《自然、文化与性别》(1980)、珍妮·库丽尔和希尔维亚·雅纳基萨科编《性别与亲属》(1987)、萨德拉·摩根编《性别与人类学》(1989)、培基·萨德和露丝·古德依纳夫著《超越第二性: 人类学中有关性别研究的新趋向》(1990)、米卡拉·特李欧纳多著《站在知识交叉点上的性别: 后现代时期的女性人类学》(1991), 等等。这些著作就母亲角色、亲属制度和婚姻关系等展开研究, 并在文化比较的视野中分析了女性的社会地位、角色和权力等与男性的差别, 从多方面论述了性别的文化建构和历史建构, 指出性别在社会权力关系组合以及生产方式变化中与阶级、种族和族群等等有着密切联系。如今, 性别理论深入到了人类学的各分支领域, 如语言人类学方面, 探讨语言行为、社会性别以及运用权力的关系; 考古人类学方面, 考察史前人类生活中性别的社会文化关系是如何产生的; 社会人类学方面, 研究亲属制度与性别角色、性别与民族主义的关系问题, 等等。过去 20 多年, 由于性别理论的自觉运用, 人类学界不断推出新的研究成果。随着性别理论成为当代 “显学”, 自然科学中的性别问题也受到关注, 有如主流写作的男性化倾向受到批判一样, 那种把女性排斥在科学殿堂之外的主流科学的男性化倾向受到质疑。 “女性主义对性别理论的兴趣并不局限于文学批评, 它也很重视在历史学、人类学、哲学、心理学和自然科学领域中的性别理论。” (4) 麻省理工学院教授伊芙琳·福克斯·凯勒在《反思性别与科学》(1985) 中, 就分析了性别意识形态在调节科学与社会形式之间关系时所起的关键作用, 该书连同她另一著作《生的秘密, 死的秘密: 论语言、性别与科学》(1992) 在女性主义科学史和科学哲学界影响甚巨。就这样, 对性别理论的自觉运用, 使得女性主义的科学批评不同凡响。

再看中国大陆, 走出十年 “文革”, 拨乱反正, 国门开放, 随着清算封建意识残余的大旗高高张起, 人们对政治上失误造成的种种经济、文化等方面问题的反思步步深入, 性别意识也在人文思潮激励下空前激活, “gender” 逐渐成为中国学术领域一个突出话题。回眸过去 20 多年, 由朱虹编选的《美国女作家作品选》和《美国女作家短篇小说选》于 1981 年和

1983 年相继出版，拉开了我国对西方“女权主义”（当时还不兴叫“女性主义”）的译介帷幕。1986 年，波伏瓦的《第二性》中译本问世，对于中国文学艺术界影响不小。1987 年，又有孙绍先著《女性主义文学》出版。从 1988 年起，由李小江主编的妇女研究丛书推出，这套丛书以我中华本土为视点，试图涵盖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伦理学、教育学、法学、文学等多方面。1995 年，随着联合国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在北京召开，相关出版物更是如雨后春笋。学术论文方面，据统计，“1980 年至 1983 年间，全国刊物平均每年发表 5 篇这方面的文章，1986 年至 1987 年间，每年 11 篇，而 1988 年增至 20 余篇，1989 年多达 32 篇，其数量逐年成倍增长。”（5）从此，“妇女研究”（Women's studies）、“性别诗学”（Poetics of gender）成为当今国人学术视野中一道抹不去的风景线。

## （二）

起自民间流传市井的戏曲向来被包含着俗文艺范畴内，其跟世俗大众的生活有着密切联系。将性别批评引入戏剧（包括戏曲）研究的必要性，从检视东西方戏剧的文化特征庶几可得说明。

瑞士人类学家巴霍芬在《母权论》（1861）中指出，“悲剧之父”埃斯库罗斯的《俄瑞斯忒斯》三部曲是用戏剧形式来描写没落的母权制跟发生于英雄时代并获得胜利的父权制之间的斗争。恩格斯赞赏此说，称为“新的但完全正确的解释”。父权制的胜利不仅仅投射在古希腊悲剧中，传统的西方戏剧观对悲剧主角的认定，跟历史上基于父权制文化预设的“男主女从”、“男尊女卑”意识不无瓜葛。西方悲剧格外看重男主角，视他们为构成重大事件的核心和推动剧情发展的动力，如“俄瑞斯忒斯就是这样支配了埃斯库罗斯和阿尔菲艾里笔下的悲剧”，因此断言“一切伟大悲剧的主要人物都只能是一个男人”；诚然，悲剧中也有女性出现，但这些女性要么是“对于剧情的发展并不产生任何直接的、有力的影响，尽管对于男主人的心灵可能产生许多间接的影响”，要么是“一个象麦克白夫人，或伊菲革涅亚，或美狄亚那样的女人，这样的女人，在其气质中，有一种刚毅的品质与严峻的目的，而这两者通常与典型的女性是联系不到一起的”，总之，“在高悲剧中，必须将女性写成刚毅的女性，其品质要接近于男性的品质，或者将女性的地位降到次要的位置上。”显然，不管是这还是那，“悲剧几乎总是牺牲女性成分来强调男性成分的”。（6）如此戏剧格局在西方是怎么形成的呢？盖在从亚理斯多德到 18 世纪，西方人普遍认为，悲剧处理的是人们的逆境与不幸，喜剧处理的是人们的快乐与欢笑，由于各自目的不同，前者描写崇高人物而后者描写卑微角色。悲剧作为人类最崇高的艺术形式，其表现对象非伟大人物和伟大事件莫属，即所谓“写进悲剧中的都是帝王将相”（史卡里格语）、“帝王的行为则是悲剧的题材”（卡斯特

维特罗语)。准此观念,悲剧主角性别向男子倾斜也就自然而然。因为,既然写入悲剧的应是帝王将相和伟大事件,既然“历史”(history)在构词上已被权力话语命名为“他的”(his)而不是“她的”(her)“故事”(story)(7),既然女性自远古便“历史性败北”于男权而成为“历史的附录”及“二等公民”,那么,这高贵人物,这伟大事件当然也就非身为“一等公民”的男子汉大丈夫莫属……就这样,古典戏剧观念和传统男权意识不谋而合,铸就了西方悲剧男角为主的思维定势。对于我们来说,要透彻认识戏剧史上诸如此类现象,离开性别视角显然不成。

对于华夏戏曲,在研究中引入性别批评是其内在要求使然。戏曲和女性在古代中国社会同属远离主流话语的边缘文化,二者天然有着诸多联系。宏观角度看,中华戏曲从发生到发展,从本体到文本,从创作到接受,以及叙事母题、形象塑造、话语模式等等,莫不有性别文化内容淀积其中,也莫不期待着研究者从性别视角去解读之。首先,从深层上讲,较之讲科学重理性更外向的西方文化,讲伦理重情感更内向的华夏文化原本富于柔性特质。以审美为例,就拿华夏民族在审美趣味和艺术风格上对“淡”的偏爱来说吧,“君子之交淡如水”,成为国人的交友之道;“大羹必有淡味”,乃是食客的经验之谈;“绚烂之极,归于平淡”,则代表着富于民族特色的艺术辩证法。除此以外,国人对静美的参悟(譬如苏东坡诗有“静故了群动,空故纳万景”),对柔美的欣赏(譬如戏曲小生从扮相到唱腔再到表演都颇为女性化,近世京剧也在“十伶八旦”的态势中向柔美型艺术定格),对圆美的推重(譬如传统文学中流行的“大团圆”叙事模式),以及施政治国上视“文治”高于“武功”、为人处世上以仁厚优于劲猛(看看古典小说中倍受褒扬的刘备、宋江之类人物的性格特征,不难明白这种价值取向),凡此种种,莫不体现出这种偏爱阴柔的文化心理。(8)在此语境中,“戏无女角不好看”的说法自来有之,女性关怀也就成为本土戏曲挥之不去的文化情结。从古到今,戏曲舞台上塑造出众多女性角色,她们的悲欢离合、爱恨苦愁,她们或平淡或伟大的生命历程,演绎出一部别具特色的中华戏曲文学史。以女性为焦点的性别话语、性别模式及性别意指等内在于本土戏曲的叙事逻辑和审美机制中,要洞穿其审美本质,要窥破演戏和观戏的心理奥秘,无视性别批评实在是难以深入。微观角度看,以地方剧种为例,受中原文化熏陶的豫剧充满着阳刚气质,在江南土壤上生长的越剧洋溢着阴柔情调,诸如此类,对之的考察亦显然不应少了性别文化视角。此外,着眼两性关系,古典戏曲艺术毕竟成熟于封建社会后期,而以压制“第二性”为特征的父权制文化在华夏历史上登峰造极恰恰在此阶段。在处处以男性价值为准的社会中,诸如“三纲五常”和“三从四德”的伦理,“男尊女卑”和“夫唱妇随”的说教,“郎才女貌”和“一夫多妻”的编码,“性别反串”

和“性别错位”的模式，等等，也就不可避免地屡屡在本土戏曲中现身说法。诸如此类，无论历史研究还是作品析说，都亟待性别批评介入。

### （三）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性别理论的引入，扭转了文艺研究中性别批评缺席的局面。随着该话题的学术增温，除了《当代女性主义文学批评》（1992）、《社会性别研究选译》（1998）等西方论著的翻译接踵而来，着眼本土社会历史的综合性论著《性别与中国》（1994）、《阳刚与阴柔的变奏》（1995）以及《性别诗学》（1999）等也相继出现，以中国文学艺术为研究对象的著作亦屡屡出版，如孟悦和戴锦华的《浮出历史地表：现代妇女文学研究》（1989）、康正果的《风骚与艳情》（1989）、乔以纲的《中国女性的文学世界》（1993）、刘思谦的《娜拉言说：中国现代女作家心路历程》（1993）、陈顺馨的《中国当代文学的叙事与性别》（1995）、林树明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在中国》（1995）、林丹娅的《当代中国女性文学史论》（1995）、刘慧英的《走出男权传统的樊篱：文学中男权意识的批判》（1995）、王绯的《睁着眼睛的梦：中国女性书写召唤之境》（1995）、齐红的《心灵的炼狱：新时期女性文学专论》（1999）、赵树勤的《找寻夏娃：中国当代女性文学透视》（2001）、李玲的《中国现代文学的性别意识》（2002）、王春荣等的《女性声音的诗学》（2003）、张宏生编《明清文学与性别研究》（2002）、陶咏白等的《失落的历史：中国女性绘画史》（2000）、邓红梅的《女性词史》（2000）以及《现代中国女作家小说选》（1981）、《新时期女作家百人作品选》（1985）、《女性文学研究教学参考资料》（1990）等等。有历史描述，有理论析说，有专题研究，有作品选集，有资料汇编，可谓洋洋大观。跨入新千年，又有“性别与文学艺术”圆桌座谈会（2001，大连）、“社会性别与文学文化及学科建设”研讨会（2002，上海）、“女性文学与文化学科建设”国际学术研讨会（2004，西安）、“中国现当代文学与性别”学术研讨会（2005，开封）等相继举办。

世纪之交，将“性别”作为关键词引入戏曲文化研究的著作亦问世。以整个戏曲艺术为研究对象，有拙著《性别文化视野中的东方戏曲》（香港，天马图书有限公司，2001）。此外，针对某剧种或某种戏曲文化现象的研究，有黄育馥的《京剧、• 跷和中国的性别关系》（北京，三联书店，1998）和杨朴的《二人传与东北民俗》（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1），前者紧扣京剧表演中的“踩跷”探讨了相关的性别问题，后者结合远古女神崇拜中的“圣婚”仪式追溯了二人转的发生学源头，二书不乏精彩论述。在海峡对岸，致力于明清女性文学研究的台湾学者华玮于2003年也推出专著《明清妇女之戏曲创作与批评》以及由她点校的《明清妇女戏曲集》，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果。20多万字的拙著《性别文化视野中

的东方戏曲》，包括“戏曲和女性”、“女权和男权”、“性别和母题”三大部分，乃从戏曲艺术和性别文化的结合部切入，借鉴性别诗学、原型理论及比较方法，就性别文化对东方戏曲的深刻影响、东方戏曲对性别文化的丰富表现以及二者的历史生成、互动关系、话语特征等展开深入探讨，从人类文化高度反思学术领域中这一不可回避的课题，由此在理性的人文阐释中体现出现代批判精神。拙著出版后，得到学术界肯定，称“在当今中国戏剧领域，从学科角度明确提出‘戏曲性别文化学’概念并对之展开系统研究的，李祥林无疑是第一人”，“在国内艺术理论界，系统地借鉴西方女权主义文学批评理论，并将其上升到性别文化学的层面，对中国戏曲进行全面研究的专著，目前仅有这本《性别文化学视野中的东方戏曲》。”该书堪称“戏曲研究的开拓创新”，具有“另辟蹊径的视角”、“别开天地的方法”和“非同凡响的阐释”。（9）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研究员叶舒宪先生 2001 年 7 月 5 日来信说：“性别文化角度的戏曲研究在国内刚刚起步，兄之贡献具有开拓性质，未来发展空间甚为广阔。……大著中女角与行当、阴柔化戏曲思维和性别假面等方面独创鲜明，对本土文化现象的认识达到‘陌生化’效应，相信启发后学处甚丰富。”叶先生在其新著《文学与人类学——知识全球化时代的文学研究》第八章“文学人类学研究在中国”中评述新时期以来本土学术成果时，列举的著作中亦有《性别文化学视野中的东方戏曲》，并称从世纪之交问世的这批著作中“可以明显察觉到在人类学视野的拓展下，中国文学的传统研究思路所发生的重要变化。其中有些研究由于切入文化无意识底层而或多或少具有了文化研究的人类学性质”（10）。厦门大学文学院教授郑尚宪先生同年 5 月 7 日来信也说：“接到先生的大著《性别文化学视野中的东方戏曲》，十分高兴。因为我有一名研究生的毕业论文选题初步定在‘性别与戏剧’范围内，此书对她无疑具有很大指导意义，我也必将从中获益不少。”近几年来，与我保持联系并有志于做这方面研究的，还有武汉大学、苏州大学等高校的硕士生和博士生。

上个世纪 90 年代中期以来，有感于本土戏曲研究领域中性别批评缺乏的现状，我在国内学术界明确提出“戏曲性别文化学”和“戏曲性别文化研究”的概念，并围绕此课题在《戏剧》、《剧本》、《戏剧艺术》、《戏曲研究》、《戏曲艺术》、《中国戏剧》、《中国京剧》、《当代戏剧》、《戏剧文学》、《上海戏剧》、《四川戏剧》、《黄梅戏艺术》、《东方丛刊》、《民族艺术》、《艺术广角》、《艺术百家》、《广东艺术》、《福建艺术》、《上海艺术家》、《民族艺术研究》、《东南大学学报》、《西藏大学学报》、《成都大学学报》、《新余高专学报》以及日本爱知大学的《中国 21》等国内外近 30 家学术和专业刊物上，陆续发表了《方兴未艾的戏曲性别文化学》、《中国戏曲·性别复调·文本分

析》、《性别视角：中国戏曲和道家文化》、《中国戏曲和女性文化》、《中国戏曲的女权文化解读》、《男权视角：缠绕古典戏曲创作的梦魇》、《精卫原型与中国戏曲》、《从性别视角读〈踏摇娘〉》、《女花脸·阴阳共体·文化原型》、《旦角审美·性别意识·文化透视》、《样板戏·权力话语·女性形象》、《历史题材·现代意识·性别视角》、《换个角度看历史》以及《性别理论·学术研究·当代批评》、《中国文化与审美的雌柔特质》、《对中国文化雌柔气质的发生学考察》、《从性别视角看儒家文化的二重性》、《女娲神话的女权文化解读》、《“伯禹腹鲧”：孤雌生殖神话的换位阐释》、《生命复活与女性崇拜：一个文学母题的跨文化解读》、《“弃子救母”故事及其文化母题识读》、《“阴阳”词序的文化辨析》、《字词文化与性别歧视》、《姓·性别·文化》等数十万字论文。多次应有关方面邀请，以《艺术·性别·文化》、《性别视角：换双眼睛看世界》、《戏曲性别文化研究：一门值得关注的新学科》等为题到书店、高等院校、科研单位作学术讲座，受到学界关注，在此课题上被称为“把一个老题做出了新意，为大家提供了‘熟悉又陌生的’东西，给人以启发”（11）。中文核心期刊《民族艺术》2000年第2期刊发了学术访谈，以8000多字篇幅对我做此课题的动机、思路、方法、价值和影响作了较全面评介。从性别视角研究中国戏曲和中国文化，在我是并行不悖的。2003年，应江西省《新余高专学报》邀请，我参与策划该刊推出的新栏目“文化与人性/性别”，并为之撰写了“开栏语”（见2003年第1期），这个栏目迄今仍是该刊的重点。此外，应日本爱知大学《中国21》杂志约稿，拙文《女娲神话与华夏戏曲》经编辑部译为日文后，刊登在2004年8月由风媒社出版发行的该刊第20辑上。该期《中国21》实为邻国学术界推出的“中国戏剧里的性别”特集，除了拙文，还有日本学者田仲一成、金文京，台湾学者华玮等关于目连戏、元杂剧、明清戏曲、中国话剧里的性别问题和女性形象研究的论文，以及中日两国学界人士合作的《角色扮演和性别》、《杨小青与越剧六十年》等访谈文章。作为《性别文化视野中的东方戏曲》之续篇，我的另一专著《戏曲文化中的性别研究和原型分析》（20余万字）也将在海峡对岸出版。

声名日彰的性别理论给包括戏曲文化研究在内的当代中华学术注入了活力，无论就自身内涵建构还是就外在空间拓展而言，其前景都是相当看好的。与此同时，也不能不指出，尽管性别分析填补了传统学术中对于性别问题和性别作用的忽视所造成的性别批评的缺席，尽管性别理论为现代人提供了反思历史和检讨现实的新视角，但并不等于说它就能取代其它所有的视角，要防止那种将性别关系视为社会关系之全部的“性别万能”的偏激观点。正如河南大学文学院女性文学方向博士生导师刘思谦教授2002年4月12日致笔者的信中所言：



“从文学研究方法论的角度来看，由于性别是人的一种属性、一种先天的生理属性和后天的文化心理构成，从性别视角切入文学文本，便会发现一些用别的视角所无法发现的文本内涵。性别之于文学研究，不是世界观、历史观，不是理论框架，更不是价值尺度而只是一种合理的分析范畴，一个阅读和分析视角，在具体操作中还必须注重综合性与超越性，才能避免唯性别论和性别决定论，而唯性别论和性别决定论从思维方式来看不过是过去的唯阶级论和阶级决定论的翻版而已。”性别关系固然是人类社会中最恒久的关系，但其表现形式和具体内涵在不同的社会历史情境中也在不断地发生变化。也就是说，从语境化角度看，人是社会条件的产物，在一个存在着种族、地域、经济和文化分层的社会中，没有单纯意义上的男人和女人，只有处在具体的种族、地域、经济和文化关系中的男人和女人。非惟不同的社会制度和政治体制会产生不同的性别模式，即使在相同的社会制度和政治体制下，性别模式也会由于经济、文化乃至宗教等因素的相异而千差万别。既然如此，对于人以及人类社会关系的分析，就只有在全面综合性别、种族、地域、经济、文化等因素中才能得到透彻阐释，这是从事包括戏曲在内的俗文艺研究的我们务必清醒的。

注释：

(1) [法国]露丝·依利格瑞《性别差异》，见张京媛主编《当代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第372—373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

(2) [美国]凯特·米利特《性政治》，见“蓝袜子丛书·美国卷”《我，生为女人》第474—476页，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5。

(3) (4) [美国]伊莱恩·肖瓦尔特《我们自己的批评：美国黑人和女性主义文学理论中的自主与同化现象》，见张京媛主编《当代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第254—265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

(5) 林树明《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在新时期文坛》，载1999年12月9日《文艺报》。

(6) [英国]阿·尼柯尔《西欧戏剧理论》第192、197—199页，徐士瑚译，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1985。

(7) 汉语“历史”，英文为“history”。如女权主义学者指出，英文“history”是由“his”（他的）而不是“her”（她的）与“story”（故事）组合而成，从构词上就表现出男性优先的性别意识。为此，她们针锋相对地提出“herstory”一词，以表达其对男权化传

统话语的逆反。

(8) 对此问题，拙文《中国文化与审美的雌柔特质》（载《新余高专学报》2000 年第 4 期）、《对中国文化雌柔气质的发生学考察》（载《东方丛刊》2003 年第 3 期）有较详论述，可供读者参考。

(9) 关于拙著的评论文章，如周企旭《戏曲研究的开拓创新——〈性别文化学视野中的东方戏曲〉读后感》（《四川戏剧》2001 年第 5 期）、叶鹏《用现代意识烛照民族艺术的新成果——评李祥林〈性别文化学视野中的东方戏曲〉》（《艺术界》2002 年第 3 期）、廖全京《在戏剧常青藤上理性地栖居——读几位戏剧学人近著札记》（《四川戏剧》2003 年第 3 期），等等。

(10) 叶舒宪《文学与人类学——知识全球化时代的文学研究》第 264 页，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

(11) 廖明君《性别文化学视野中的东方戏曲研究——李祥林访谈录》，载《民族艺术》2000 年第 2 期。

作者：李祥林，男，研究员，中国艺术人类学研究会理事，中国俗文学学会理事，中国傩戏学研究会理事，四川省民族民间文化保护工程专家委员会委员，主要从事戏剧、美学、中国文化研究，已出版的著作有《性别文化学视野中的东方戏曲》（香港：天马图书有限公司，2001）、《元曲索隐》（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2003）、《中国书画名家画语图解·顾恺之》（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中国书画名家画语图解·徐渭》（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齐白石画语录图释》（杭州：西泠印社，1999）等等。

“中国俗文学学会第五届会员代表大会暨‘俗文学研究的理论与方法’学术研讨会”论文

（2006.4，北京大学）